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鲁迅



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鲁迅生于 1881 年，当时正是清王朝封建统治濒于崩溃，社会矛盾异常激化的年代。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几十年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事件不断发生，而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对内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对外则一味地卖国求和，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了中国的国土，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从沿海到内地开辟了几十个通商口岸，并在上海、汉口等 10 多个城市中划定了租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欺凌，满清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制，使祖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鲁迅的少年时代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悲的国破家亡的境遇里。

鲁迅姓周，名树人，母亲姓鲁，鲁迅是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开始用的笔名。他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他的父亲周伯宜，是个读书人，曾经考中过秀才；祖父周介孚，当时任翰林院编修，正在北京做官。鲁迅的家庭，是一个开始没落、但还有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也就是有封建功名的官宦人家。

鲁迅的母亲姓鲁名瑞，娘家在绍兴乡下，她虽没有读过书，却通过自学达到了读书看报的程度。母亲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直激励着鲁迅。他日后以“鲁迅”作为自己最常用的笔名，母亲姓鲁也是一个原因。少年鲁迅的家中，除了父母，还有祖母和曾祖母等 10 多人，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周家老屋的后面，有一个长满杂草的园子，叫做百草园。这里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在这里弹琴。一年四季，这普普通通的菜园子都有无数的乐趣成为少年鲁迅难以忘怀的乐园。

按照当时读书人家的老规矩，孩子到一定年龄就要请老师到家中教他读书识字，或者送到老师家去就读，叫做开蒙或入塾。

鲁迅 12 岁那年，鲁迅转到三味书屋读书，这里号称是“全城最严厉的私塾”。学生在三味书屋，一般先读“百家姓”，再读“神童诗”，以后渐渐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鲁迅天资很高，家里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胡羊尾巴”，意思是短小灵活，敏捷利落。他不但聪明，而且勤奋。不满意正統的封建教育，就自己寻书看。他读过许多野史、笔记、杂记，对民间的戏剧、绘画和传说十分爱好，喜欢收集和购买画册，描摹和观赏美术作品。

少年时代，鲁迅常常到乡下外婆家住。在那里，他接触到在狭隘围墙里想象不到的新鲜事，同农民的孩子感情融洽，亲密无间。这使他逐渐了解了农民勤劳、质朴的性格，目睹了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

鲁迅后来回忆到：“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不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一样了。”

1893年，在浙江省的科举考试中，鲁迅的祖父因科场行贿被逮捕下狱。消息传来，全家惊恐万分。鲁迅便随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乡下避难，饱尝了世态炎凉。过了半年，气氛逐渐缓和，鲁迅等人迁回城里，但父亲又恰在这时患了水肿病。在这几年中，祖父在杭州监狱里，花销很大；父亲治病，也要用大量金钱，家境很快败落下去。家里没有钱了只好靠典当衣物来维持生计。鲁迅是当家的长子，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肩上，他几乎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他从比自己高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与他一样高的柜台上给久病的父亲买药。因为开方的是“名医”，所用的药引也十分奇特：甘蔗要经霜3年，蟋蟀也要原

配，鲁迅不得不为此而忙碌不休。这样所谓“名医”，诊金很高，但医术里却掺杂了不少迷信落后的成分，这样一来，父亲的病就越治越重，终于死去。经过一连串的剧变，鲁迅的家庭彻底破落了。

一连串的不幸与打击，深深震动了鲁迅的心。他尝到了穷苦的滋味，也渐渐明白了社会的不平和黑暗。多年以后，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之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又在给别人的信中，十分坦率地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很感激父亲的穷下来，……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

自从父亲去世后，鲁迅就再也没有再到三味书屋去读书。三味书屋的同学们也各奔东西，有的到钱庄去作生意，有的到丝绸店去当小老板，有的则到外地去作幕僚，这是当时绍兴破落读书人家子弟所惯走的几条路。鲁迅却厌恶这种生活，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他告别了家乡的亲人，走上了漫长的求索之途。

二、“戎马书生”

18岁那年，鲁迅来到南京，考取了江南

水师学堂的“试习生”。第二年春，又转到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

鲁迅在南京的几年间，中国历史经历了触目惊心的剧变，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猖狂入侵，辛丑和约以更加骇人听闻的条款来掠夺中国的利益和主权。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潮，也像他的前辈，那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一样，为了拯救祖国，开始了深刻的思索和热烈的追求。他想寻求的一种真理，能够把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南京求学期间，鲁迅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英国赫胥黎所写的《天演论》一书。这是一部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曾在西方风行一时。1896年，中国维新派著名思想家严复把它翻译过来，在天津出版的《国闻周报》上连载，后来又单印成书。

这是一本很不平凡的书，加上严复准确流畅的译文，和他借题发挥的、发人深省的一些“按语”，不能不引起每一个爱国者的深思和焦虑；一个古老而落后的国度，你过去是那么的辉煌，可今天你怎么如此老态龙钟呢？

鲁迅接受了进化论中发展变化的辩证

因素，在政治上要求社会变革；在思想上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的观点，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

鲁迅自称“戎马书生”，喜欢练习骑马，常常从马上摔下，弄得皮破血流，还是继续苦练，“落马一次，即增长一次进步。”终于练就了良好的骑术，甚至敢于和精于骑射的旗人子弟竞赛。

鲁迅有一方篆体印章，刻着“戎马书生”4个字。此外，还有两个图章，一个叫“文章误我”，另一个叫‘戛剑生’，意思是“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爱国的情在胸中激荡，这时的鲁迅，俨然是一个“投笔从戎”、“捐躯杀敌”的热血青年。

鲁迅知道，要报效祖国，光有强健的身体、坚强的体魄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他学习非常认真，各门成绩优异，曾获得了全班唯一的金质奖章。他注意搜集国外关于中国地质和矿产的著述，又翻阅了各地的方志，将地质情况和矿藏分布，逐一记录下来。

在矿路学堂实习时，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不断地思考着：国家固然需要科学，需要更丰富更充实的科学技能，但在这之外，难道就不需要些

别的东西吗？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接踵而来的内忧外患，劳苦大众的艰难生活，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变法维新的不断失败，这一切无不强烈地冲击着鲁迅。中国向何处去？个人要为此贡献些什么？这是当时许许多多爱国志士所苦苦思索的问题。鲁迅接触了许多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著作，开始形成了一种想法：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从“新学”中受到新的教育的鲁迅，又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爱国图强的思想，他不会去走前人走不通的老路了，他决心到国外去，继续寻求新鲜的知识 and 救国的真理。

三、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2年1月，鲁迅在矿路学校毕业后不久，适逢江南督练分公所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鲁迅便和另外几个同学一道，被派往日本。

初到日本，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在这两年中他经常思考，要拯救祖国，就要进行革命，要革命，就要唤醒愚昧落后的群众。可是，怎样唤醒民众呢？他开始形容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他经常与中国同学们共聚一室，高歌“狂论”。鲁迅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

奴隶的时候，因而相对叹息。由于身在异国，刺激多端，他便深入地思考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并提出相互关联的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对于这三个问题的研究，鲁迅一直孜孜不倦。他想从这里寻找民族落后的原因，探求改造“国民性”的根本途径。鲁迅这时的思想，不同于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民主派狭隘的“排清情绪”，他开始把祖国的前途、命运同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联系起来考察。

1903年春，鲁迅不顾重重压力，毅然剪去了象征清王朝反动统治的辫子，写了《自题小像》一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全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的大义是，祖国正深陷于风雨飘摇的灾难之中，我将爱国的衷情寄托寒星转告给祖国人民，可惜同胞们尚未觉醒，还不能理解。不论前途多么崎岖艰险，我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献给祖国。这是一首光辉的爱国主义诗篇。在这首诗中，鲁迅充分表达他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伟大抱负。

鲁迅到日本留学的根本目的，是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学习、掌握为祖国服务的本

领。他学习勤奋，常常在自修室里用功到深夜，所以进步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日语这一语言工具。

两年以后，鲁迅离开东京，来到日本北部一个偏僻的市镇仙台，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

选择医学，本来是鲁迅预定的目标。早在南京求学时，他就从翻译过来的日本历史书上，知道了西方医学对日本政治改革曾起过很大作用。于是年轻的鲁迅决定投身医学。他当时想得很美好，以为学好医学，既可以救治像自己父亲那样被误的病人，又可以促进人民归于政治改革的信仰，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日本自 1967 年“明治维新”以来，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日本很快发展成为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统治者对外侵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鲁迅留学日本时，中日“甲午战争”已结束 10 年，但是，在学校里，在军国主义教育的培养下，许多日本学生抱着狭隘的民族偏见，像鲁迅这样的中国留学生自然就受到一部分同学的歧视，侮辱无端地飞来。

第一年的学习成绩公布了，鲁迅由于平时学习刻苦努力，成绩还不错，但多数功课也只是及格而已，在同级 142 名中名列第 68

名，可以升级（有 30 人因总成绩不及格而留级）。但这就要遭到某些人的怀疑和妒忌了。一时间，学生中谣言四起，盛传上学年解剖学考试的题目，是藤野先生在讲义上做了记号，让鲁迅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

鲁迅的老师藤野先生确实非常关心鲁迅的学习，他亲自翻阅、订正了鲁迅所抄的讲义，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义。但泄漏考试题目一事，纯粹是无中生有。在鲁迅和周围一些有正义感的同学的据理力争下，流言不攻自破。

这件事使鲁迅受到了深深的刺激，因为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侮辱。早在东京时，就有一串事情使他感到气愤：大阪博览会人类馆将中国人作为野蛮人种陈列，神田警察局解散了中国留学生成立的拒俄义勇队，成城学校联队教官侮辱中国留学生。……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鲁迅暗自慨叹：“难道因为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学生就是当然的低能儿么？分数在 60 分以上，就不是自己的能力了吗？”

不久，新的打击接踵而来。

1905 年秋天，鲁迅已是医学专门学校二年级的学生。一天上细菌课，教师一面用电影显示着细菌的形状和活动情况，一面作着讲解。课程讲完了，但还没到下课的时间。

和往常一样，又加放了一点时事影片。那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不久，时事画片多是些战争的镜头，每当日军胜利的场面出现时，课堂里便立刻欢呼起来。

对这种情况，鲁迅实在觉得庸俗而无聊。想不到，这一次却在画面上看到自己的中国同胞了：一个人被绑在中间，据说是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抓到了，要被砍头示众；在四周围看热闹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一个个体格健壮，却又都显出麻木不仁的样子来。

“万岁！”课堂里又像往日一样爆发出一阵阵喝彩声。对鲁迅来说，这欢呼是那么刺耳，在他心灵深处引起了剧烈的震动，以至把他继续学医的念头都轰毁了。被愤怒和痛苦折磨着的鲁迅，心情沉重地离开了教室。

严酷的现实，使鲁迅开始打破原来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通过学习西方医学来拯救祖国的幻想破灭了，迫使他寻求一条新的生活道路。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从那一回以后，他深深地感到学医并非一件最紧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在当时，他认为人生第一件紧要的事，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人们精神的是文艺，于是他想到要

提倡文艺运动。

不论是从事医学或文学，鲁迅所考虑的主要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决定弃医从文，在鲁迅的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06年3月，他办理了退学手续，便离开仙台，前往东京。他决定不再正式进入学校，主要通过自修阅读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撰写文章，从事文艺活动。

当时的日本东京，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海外活动的中心，1905年，孙中山把原来的革命团体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了统一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号召推翻满清统治。

同盟会成立前后，鲁迅结识了许多革命派人物，如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鲁迅同他们保持了密切的交往。他的住处几乎每天下午都有朋友来访，畅谈彼此的志趣，交流革命活动情况。革命思想的熏陶，更激发了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希望、失望与求索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第二年便回到故乡，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监，并兼任博物学、生理卫生学的教员。

鲁迅离开故乡已多年，可故乡一点也没有变化，依然是满目创痍，一片萧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杭州和绍兴也先后宣告光复。鲁迅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召集学生组织“武装演说队”，上街宣传革命。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却使鲁迅感到了极度的困惑：革命党人张金发等人在旧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下，失去了警觉，对杀害秋瑾的刽子手“不念旧恶”，财主豪绅也纷纷挂起了“革命”的招牌，“咸与维新”了。劳苦大众依旧过着困苦的生活。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使鲁迅感到异常失望和痛心。

1912年春，鲁迅应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又随教育部迁到北京。

鲁迅任职教育部，本希望能为革新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尽一些力量，但是，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教育部的腐败景象，却使他感到了极度的失望。这时，临时政府虽然才成立不久，却已经暮气沉沉了。资产阶级把政权拱手让给了封建势力，窃国大盗袁世凯原是清王朝的一个北洋大臣，他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摇身一变，很快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随后立即亮出屠刀，残酷屠杀革命志士。袁世凯当了总统，还想当皇帝，大搞帝制活动，并派兵

镇压各地的反袁斗争。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袁世凯刚刚爬上“龙床”，当了83天的皇帝，就在人民的反抗怒潮中一命呜呼了。不久，又出现了张勋复辟的丑剧。继袁世凯、张勋之后，统治中国的是其他几个北洋军阀。政治的腐败，人民的困苦，日甚一日，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密不通风的铁屋子。

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的衙门，也是一片混乱和黑暗。总长和次长们像走马灯上台下台，他们大半不是要来办什么教育，而是代表着一派势力来占地盘，当官僚。在这些人的统治下，教育部的工作人员除了每天签到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办。面对黑暗现实，鲁迅内心十分痛苦。他一面思索着中国的现实问题，一面开始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刊工作，收集中国古代石刻画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

年轻时代的激昂慷慨，被岁月逐渐地侵蚀了。寂寞一天天地增长起来，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灵魂。他深刻地反躬自省，认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许许多多血的事实教育了鲁迅，使他在沉默中认真探索中国的历史和社会，进一步思考着中国前途与出路。他曾热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在经历了辛

亥革命的波折以后，他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了信心，他后来总结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由于一时看不到中国社会的出路，鲁迅曾经“怀疑过自己，怀疑过中国和中国人，怀疑过人类为之奋斗的一切事物的价值”。他说过：“我曾经是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后来，我逐渐发现了自己，逐渐对自己的怀疑产生了怀疑。”

时光就在苦闷和寂寞中，一年年地过去了。补树书屋的前面有一株槐树。夏天的夜晚，鲁迅常常摇着蒲扇，独自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的缝中仰视那一点点青天，苦苦思索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出路。不在寂寞中爆发，那么就要在寂寞中灭亡。鲁迅急切地盼望着打破寂寞的时刻早日到来。

有一天，鲁迅正在会馆里抄古碑，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提着皮包走了进来，劈头质问道：“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鲁迅问答说。

“那么，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作一点文章……”

鲁迅理解他的心情，当时，钱玄同正和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正竭力寻求支

持，希望鲁迅也能加入到他们的战斗行列中去。

在这次谈话中，鲁迅把当时的旧中国比喻成没有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都要闷死了”。是唤醒他们呢，还是让他们从昏睡中入于死灭？“如果惊起来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来受无可挽回的临终的苦楚，这能对得起他们吗？”鲁迅提出并思考着这个问题。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是的，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希望在于未来，这是鲁迅的一贯信念！

1917年11月7日，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选择民族的出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被压迫的中国人民开始行动起来，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对其失败深感痛苦但又找不到出路的鲁迅，怀着急切的心情，渴望投身到这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中，人民也在迫切期待着像鲁迅这样勇敢而坚定的战士。

五、新时代的“呐喊”

1919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从1918年1月起，鲁迅参加了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刊物《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新青年》的发起人之一李大钊，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积极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并负责北方党组织的工作。鲁迅经常参加《新青年》的编辑会议，从这时开始，鲁迅和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通过一个“狂人”的自述，对于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抨击，把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赤裸裸地揭露出来：在这历史上，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从字缝里才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整个旧中国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相互“吃”来“吃”去的关系，这种吃人的罪恶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人们不以为是反常，反而认为是正常的。“狂人”诅咒吃人的人，他憧憬未来，预言“真的人”

要出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召唤人们为彻底改造旧中国而奋斗。

《狂人日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它的发表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也奠定了作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从此，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

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作品。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一个旧时代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热衷科举，一辈子却连半个秀才也没有捞到，却养成了好吃懒做和自视高人一等的恶习。他的日子越过越穷，甚至沦为窃贼，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终于在世人的讥笑中悲惨地死去。

小说《药》是根据秋瑾烈士牺牲的素材来创造的，通过人们在华老栓家的对话，描绘出一个革命者夏瑜的形象。在他被杀时，群众对他并不了解，却用他的血当做药来治病。在小说里，作者一方面表现了人民尚未觉醒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揭示了辛亥革命中革命者脱离群众、孤军奋战所导致的失败。

小说《风波》取材于 1917 年张勋复辟的历史事件。在小说中，革命除了剪掉农民七斤的一根辫子之外，并没有给农村带来什么变革，况且这根辫子并非七斤有了什么认

识，自动剪掉，而是因为进城不慎被剪的，当“皇帝坐了龙庭”的消息传来，一根被剪掉的辫子，又居然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了那么严重的惶恐和不安。小说中赵七爷的头上有条看得见的辫子，那是他复辟帝制的明显标志；七斤等农民虽然没有辫子，但辫子所体现的封建思想，仍然象毒蛇一样缠住他们不放。通过一根辫子的去留，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故乡》通过第一人称“我”回乡见闻和追忆，展示了当时农村萧索、凄凉的生活场景。鲁迅通过闰土的一生，探索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道路，为的是引起人们注意，以便设法改变它，扭转它，期望下一代“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期望被压迫者能够醒悟过来，开辟自己的生活道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在《一件小事》中，鲁迅通过“我”乘人力车时所遇到的一个意外事故，歌颂了劳动人民无私无畏、正直善良的高尚品质提示并批判了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劣根性。

1921年冬天开始陆续写出的《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重要的一篇，它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压迫和毒害的贫苦农民阿Q的形象：阿Q没有家，也失掉了土地，成了一个没有固

定职业的流浪雇农，他既有农民式的质朴和愚蠢，也沾染了游手之徒的不良习气。他已完全破产，却总夸耀过去，幻想未来，自我安慰，自轻自贱，以“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始终不能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现实。当革命来临时，他也想要起来参加革命，但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窃取了革命果实，反过来不准他革命，阿 Q 最终在莫名其妙的罪名下被拉去枪毙了。

《阿 Q 正传》在报刊上刊载后，引起当时社会上许多“正人君子”的恐慌和不安，以为小说的某一段似乎是在骂他们，因为只有某人才知道他这一段“私事”，因此疑神疑鬼。事实上，鲁迅并不是在讽刺某个人，他所谴责的是整个旧中国，旧制度。他为阿 Q 作“正传”，要画出来的却是“这样沉默的国民灵魂”，要写出在他眼底所经过的旧中国的人生。他所描绘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变化和农民的悲惨命运。

阿 Q 的形象塑造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确立了鲁迅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用小说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尝试，集中体现在《阿 Q 正传》中对“精神胜利法”的描写上：阿 Q 是生活在社会底层，受尽压迫欺凌，经常陷于失败境地，但自己在精神上又“常处优胜”。阿 Q 挨过赵太爷的嘴巴、赵秀才的竹杠、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常被王胡等闲人

们拉到墙上碰头，有时甚至还打自己耳光，……他几乎随时随地都要受到别人的压迫、侮辱，但他又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转败为胜，得到精神上的“胜利”。这种把失败当做胜利，把耻辱当做光荣的可耻可笑的病态思想，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屈辱地位的产物，是没落时期封建的意识形态。鲁迅对阿Q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进而对中国这个被压迫民族及人民的历史命运进行的深刻的反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多以生命进化论来论证社会改革的必要，但社会改革必须依靠什么力量，通过什么途径呢？在这一时期，他曾寄希望于少数先驱者，并提出改革国民性的主张，这就是通过思想启蒙工作，以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进化论的思想使他寄希望于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期待他们起来呐喊，起来斗争，担当改革社会、拯救祖国的重任。鲁迅心目中的先驱者，其实就是指较早接受革命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

1923年9月，鲁迅把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十几篇小说，汇编成一个集子，题名《呐喊》，这是新时代的呐喊，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五四”运动后，鲁迅继续在教育部任

职，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为了培养新青年，他从1920年8月起，先后兼任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的教学职务，并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小说史。

1924年到1925年，鲁迅又陆续创作了11篇小说，编成了第二个小说集《彷徨》，继续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前的社会现实。

《祝福》是《彷徨》的第一篇。故事中的祥林嫂，是旧中国受到重重压迫和蹂躏妇女的典型，在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所编织的罗网当中苦苦挣扎，最终未能摆脱家破人亡、惨死街头的悲惨命运。

在《彷徨》中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其它小说中，鲁迅又通过吕纬甫、涓生和子君等形象，探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

鲁迅说过，他写小说“不过是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多次谈到他作起小说来的目的是想“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鲁迅的小说，深刻地描绘了近代中国国民灵魂的图画，成为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

六、直面淋漓的鲜血

1925年5月,在北伐战争胜利推进的影响下,北京爆发了“女师大事件”。

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叫杨荫榆,在校内实行封建家长统治,不准学生参加纪念“国耻日”的爱国运动,并借机开除了6名学生会干部,学生们忍无可忍,发起了一场“驱羊运动”,当时鲁迅正在女师大兼任讲师,对于进步学生的行动表示同情和支持。

正当女师大学潮发展过程中,上海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一场全国性的反帝高潮蓬勃兴起,对于女师大学生运动形成了有力支援。北洋政府强行关闭并解散女师大,并派打手殴打和禁闭学生,非法罢免了鲁迅的教育部佾事的职务。

鲁迅愤怒地抗议反动当局的迫害,更加坚决地同进步学生站到一起。女师大的斗争得到全国各界同胞的同情和支持,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当局被迫宣布校长杨荫榆辞职,恢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收回对鲁迅的免职令。

1926年春,在南方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下,驻扎在北方的冯玉祥也倾向革命,他所指挥的国民军接连战胜了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封锁了大沽口。日本主子眼见战事失利,决定亲自出马。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强行

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驻军，国民军被迫开炮还击。3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联合英、美、法等8国列强，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无理要求中国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撤除津沽防务，并勒令段祺瑞政府在48小时内，即3月18日前作出答复，妄图威逼北洋政府进一步卖国投降，共同镇压北方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首先在北京展开，并迅速推向全国。北京市的总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联合发出了紧急通告，号召各界人民支持国民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系军阀，助长中国的内乱。3月18日，北京民众3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反对八国通牒的群众大会，并开始进行示威游行。一部分青年学生和各界代表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正当代表进行交涉时，段祺瑞命令卫队向赤手空拳的群众开枪射击，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40多人当场毙命，受伤者达200多人。枪声持续了10多分钟，随后又从大红门中涌出早就准备好的大刀队，手执铁棍、大刀向人群砍杀过去。女师大学生会主席刘和珍和杨德群等几个女同学先后被屠杀。

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鲁迅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祺瑞政府又下了一道通缉令，通缉“暴徒”首领李大钊等人；过了不久，在北京的报刊上，又登出了第二批通缉名单，其中也包括鲁迅。

3月25日，女子师范大学为刘和珍等人召开追悼会，鲁迅也赶来参加。他不忍在会场久留，独自一人在礼堂外徘徊。一个学生走来问道：

“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点什么没有？”

“没有。”鲁迅回答。

“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追悼会结束后，鲁迅在极度悲愤的心情之下，写下了一篇感人至深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

“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并非人间，40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有什么言语？”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三·一八”以后，当局的迫害日甚一日，鲁迅不得不改变住址，还曾一度往医院

避难，但他始终坚信：真的猛士，是不惮于前驱的。

七、南下广州

“三·一八”惨案之后，北京的局势动荡不定。4月间，段祺瑞被迫下台，逃到天津，国民军也退往西北。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先后盘踞北京，政治环境十分险恶。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政治迫害，鲁迅于1926年8月离开北京远赴上海，随即应厦门大学的聘请，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

在厦门期间，鲁迅把过去的文章，编成一个题为《坟》的集子，这就包含有对过去来个总结的意思，即他在《题记》中所说的“埋葬”。他在文集的后记中，通过无情的自我解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清理。这是旧的终结，也是新的开始。他在思想上更接近了工农群众，深信“世界却正是由愚人造成”的，他下决心要和旧传统、旧思想、旧世界实行彻底决裂。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又因为从旧垒来，情形看得比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死命。”

这时，大革命的风暴已经在南方掀起。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革

命的暴风骤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鲁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振奋和鼓舞，他决心毫不犹豫地投身到革命策源地广州，来“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

1927年1月，鲁迅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从厦门来到了广州，成为这所大学唯一的正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和大学教务主任。

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鲁迅曾经冒着危险两赴香港，作了《无声的中国》、《老子已唱完》。内容虽然是“七八年前的常谈”，却是有感而发，为了抨击当时的现实。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香港，鼓吹“国粹”，提倡文言文、旧道德者，仍大有人在，他们竭力要把中国变成“无声的中国”。鲁迅揭露帝国主义鼓吹“国粹”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个腐败的民族”，他号召青年发扬五四精神，反对旧文化，“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鲁迅受到以共产党员毕垒为代表的青年学生的热烈欢迎，鲁迅通过毕垒，和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阅读了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少年先锋》等刊物，了解了党的活动和主张。他还曾秘密会见了中共粤区区委书记陈延年，进行了一次推心至腹的交谈。

当时的广州，被称为“国民革命的策源地”，是革命的大后方，但鲁迅从南下数月来的所见所闻，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革命中潜在的危机。4月10日鲁迅写下了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引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和自己的切身教训，告诫人们在胜利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警惕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阵营破坏的危险性。

1927年4月12日，鲁迅的墨迹未干，“四·一二”政变便在上海发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广州从4月15日起也开始大批逮捕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山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在其中。

事件发生的当天，鲁迅冒雨参加了中山大学的紧急会议，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于是他愤而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和文学系主任的职务。

在广州的日子里，鲁迅亲眼目睹了这场空前的大屠杀：有许多昨天还和他见面的青年，今天却可能走向刑场；今天还收到来信的青年，明天给他们的复信却又不知寄到那里。他曾回忆那时的情形说：“我一生从未有见过这么杀人的。”“角色又是青年”。“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刚刀的，用软刀的，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一面顽强地坚持战斗，一面总结着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在一封信中写到：“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更留情面。”过去，他相信进化论，总觉得青年必胜于老年，但在反革命政变的日子里，他亲眼看到青年分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阵营，反共青年捕人、杀人的凶恶程度，并不比壮年差。于是，鲁迅思想中的进化论，被激烈的政治斗争轰毁了，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进化论的思想，并不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中国。鲁迅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

从“五四”时期起，鲁迅就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1927年以后，鲁迅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1928年，在鲁迅的224笔书帐中，关于马列书籍的就有60多笔。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岁月，鲁迅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并通过各种途径，购买、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

就这样，在大革命的危急关头，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里，鲁迅通过严肃的自我解剖，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书稿中，他奋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草木，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八、横眉冷对千夫指

1927年9月底,鲁迅辞去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职务,乘船经香港来到上海。从10月开始,鲁迅与夫人许广平,开始在上海定居下来,从事写作和著译工作,投入了新的工作与生活。

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他的帮助下,上海出版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鲁迅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既是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他把这一工作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曾说:“我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是在煮自己的肉的。”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参加发起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柔石等人。鲁迅被选入7人常务委员会,成为左联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他还参加了革命群众团体“自由大同盟”。

左联成立后的主要功绩,是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培养文学新人,而这是与鲁迅的辛勤劳作密不可分的。鲁迅领导左联的工作,不是由于一种什么法定的关系,而是像老战士带领一批新战士那样,自己走在队

伍的最前面，同时非常亲切、具体和周到地照顾与教育着新战士。

鲁迅认为，新生的一代，是中国社会的希望。在文化战线上，他既是伟大的战士，也是辛勤的园丁；他一面冲锋陷阵，一面呕心沥血，热心培育后辈青年。左联中的许多成员和广大文学青年，对于鲁迅“如山的恩情”，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刚从狱中出来，找不到党，无亲无友，生活无着，甚至流浪街头，却都由于找到鲁迅而得到了有力的援助。

培养和教育青年，是鲁迅毕生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虽然他习惯于夜间写作，他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迫害，使他和青年们的联系，受到一定限制，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和青年交往。他们的联系多采用通信方式进行，通过写信，青年作家、木刻家、青年学生、职业青年等，从鲁迅这里获得了许多教益。对于青年人的来信，鲁迅总是有来必往；对于青年人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有问必答；对于青年人的热情要求，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设法予以满足。对于那些冒着危险登门求教的青年，鲁迅不管工作如何繁忙，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鲁迅十分健谈，他们谈话往往进行得很久，常常废寝忘食，如果有一段较长时间不见青年人来，鲁迅就会感到不安，生怕会有什么意

外发生。

1931年1月15日，左翼作家、共产党员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等人在上海东方饭店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被英国工部局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

柔石被捕时，敌人在他的衣袋里搜出了鲁迅的印书合同。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想迫害鲁迅了，这下有了借口。消息传出，鲁迅不得不烧掉朋友们的信件，和夫人许广平带着孩子来到一家日本旅馆避难。风声一阵紧似一阵，有的说鲁迅已经被捕，有的说鲁迅已被杀害。

1931年2月7日夜，柔石等左联5烈士和其他几十个革命者，被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当局严密封锁了消息，禁止国内外报刊透露。烈士的战友想尽一切办法，才打听到他们的下落。

听到噩耗的当夜，鲁迅独自一人徘徊在寓所的院中，周围一片死寂，人们都已入睡，连同自己的夫人和孩子。鲁迅沉痛地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战友，中国失去了很好的青年。在悲愤之中，吟出七律一首，以寄托自己难以排遣的哀思：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不久以后，鲁迅起草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中国作家致全世界书》，交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在国外发表，向世界人民控诉国民党当局的血腥屠杀。史沫特莱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请他慎重考虑，鲁迅毅然决然地回答：“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同年夏天，鲁迅主持编辑《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了鲁迅参与起草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向全中国、全世界控诉国民党屠杀作家的两篇宣言，还发表了鲁迅撰写的《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先驱的血》两篇文章。

1933年2月，为了悼念左联5烈士殉难两周年，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在这篇感人肺腑的散文中，鲁迅追忆他和殷夫、柔石的交往，描绘他们淳朴而坚强的性格，叙述了战友们被捕和牺牲的经过，沉痛地说道：“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30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

吸，……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1933年初，在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非法监禁、屠杀革命者的宣言，揭露了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法西斯罪行。反动政府指示特务在6月18日暗杀了杨杏佛，随后又开出黑名单，妄图暗杀鲁迅和“民权保障同盟”的其他成员，并在杨杏佛的追悼会场做了布置，形势十分险恶。鲁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谢绝了朋友的劝阻，毅然前往参加入殓仪式。他锁上房门，不带钥匙，做好牺牲的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去和敌人斗争。鲁迅的浩然正气使特务们心惊胆颤，加上大家的保护，敌人终于没敢下手。事后，鲁迅激动地写下了向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的誓言：“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在险恶的环境中，为了安全地保存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其它图书资料，鲁迅和内山先生商议，以店员镰田城一的名义，租用了一个房间，作为秘密藏书室。这里满屋都是书，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就是书架，随时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为了确保安全，鲁迅还在门口继续挂着“镰田城一”的木牌。

1932年10月，鲁迅应柳亚子之请，曾作过一首七律《自嘲》，来概括自己当时的处境：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是鲁迅旧体诗中最为人称颂的一首。他以幽默的笔调，描绘了自己在国民党文化“围剿”中的艰难处境，表现出“为敌为我，了了分明”的爱憎情感和“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独特风格。尽管如此，这首诗的感情还是非常深沉的。曾经有一次，鲁迅把诗的大意讲给内山完造听，听的人哭了，鲁迅自己也哭了。当时，他正处在八面攻击当中，想到自己处境，想到多灾多难的祖国，鲁迅难以抑制自己悲愤的感情。

九、韧的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政策，节节败退，拱手让出了东北的大

好河山。他们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不断向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

日本侵略者把战火从东北引向东南，1932年1月28日，日寇突然进攻上海，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鲁迅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所强加的战祸之苦。他所居住的公寓，正面对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司令部，随着战事的日益激烈，鲁迅不得不带领全家老弱，迁到内山书店的楼上避难。

就在战火蔓延之际，鲁迅和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呼吁全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团体及作家，立即起来援助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

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鲁迅逐渐认识到改造中国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必须进行持久的、韧性的战斗，他认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必须坚持种种具体的、切实的、有益于革命的工作。在鲁迅晚年，使用最多的是杂文这种文体，鲁迅把它作为“匕首”和“投枪”，用这一武器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痛斥反动当局的卖国丑行。

早在“五卅”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屠杀，以及种种损害民族尊严的舆论，鲁迅就

曾连续写过许多杂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反对“辩证”，反对向帝国主义搜求“公道”，要求中国人民“抽刃而起”，把帝国主义这个凶恶对手当做“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坚持“奋斗 30 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他提出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韧性原则，一定要让敌人“以血偿还”。

1932 年，鲁迅写了《文章与题目》、《天上地下》等杂文，抨击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性和欺骗性。鲁迅指出，它的实质就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所谓“安内”就是日本兵在边境抛炸弹的同时，国民党在“腹地”里抛炸弹，共同屠杀中国人民。鲁迅还在书信中尖锐地指出：“中国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结的时候，总是自己先动手，先将本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1931 年 12 月，全国各地学生到南京请愿，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国民党下令逮捕、枪杀爱国学生，胡说请愿的结果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鲁迅写了《友邦惊诧论》，指出：“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

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杀戮；党国让我们遵从“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们就不但“镇压”，而且诬陷杀戮。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实质和英美帝国主义纵容日寇侵略，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在国难声中，许多书刊大谈“日本研究”，鲁迅发表了《“日本研究”之外》，指出：“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云南失掉了再来研究法兰西。”我们“尤其应该研究自己”。“我们也无须再看什么亡国史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历史，这里所指示的是叫战，是活路，而不是亡国的悲叹和哀号。”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他与内山完造、增田涉等日本友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深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相处十分重要，他自己就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贡献了很大力量。但是，在民族危急的关头，他毫不留情地揭露日本对中国的吞并野心。不论他与日本友人的交谊如何深厚，但在涉及民族尊严和利益的原则问题上，鲁迅从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对于那些以征服者自居的挑衅者，他多次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进行斗争。他始终站在殖民、半殖民地人民的立场，坚守民族气节，替被压迫

民族和人民呼号，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景仰，也受到日本友人的赞誉。

十、共产党人最可信赖的战友

鲁迅曾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杂文，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掩饰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之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是的，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鲁迅对祖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他找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鲁迅同党的密切关系，主要是在以左联为基地的革命文学运动中结成的。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领导人之一，1931年1月，他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的残酷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同年5月，因上海党的地下

机关遭到破坏，他便避居到茅盾家中，一面养病，一面从事翻译，并参加了左联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

鲁迅了解到瞿秋白具有良好的外文功底，便请他多多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瞿秋白写信给鲁迅，一开始就以“敬爱的同志”相称，鲁迅的复信，也每每称瞿秋白为“敬爱的 J.K 同志”。他们通过密切的互访和书信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常常在一起探讨、切磋翻译问题，并在文坛上相互声援，同各种反动势力进行英勇的斗争。

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几度遭到破坏，瞿秋白同志也数次到鲁迅家中避居，在白色恐怖之中，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瞿秋白这位国民党瞩目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不仅没有遇到危险，而且在生活中得到了照顾和安排，并得以便利地参加工作。

1934 年，瞿秋白同志接到中央通知，离开上海，前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次年 3 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军队逮捕。鲁迅闻讯以后，曾多方发起营救，未获成功。当年 6 月，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消息传来，鲁迅悲痛不已。为了纪念亡友，鲁迅联系上海文化界，筹资为瞿秋白出版纪念文集，鲁迅亲自主持文稿的编辑、校对、题签、封面设计等工作。直到鲁迅生前的最后几个月，

他仍忙碌于文集的印刷和出版。1936年，以STR（史铁儿，即瞿秋白笔名）为书名的烈士文集《海上述林》上册，终于在鲁迅生前如期出版了。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红军将领陈赓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当时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差，党组织就秘密地把他送到上海来治疗。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关切。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红军的战斗情况，但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总是得不到确实的消息。趁这个机会，鲁迅多次邀请陈赓同志到他家中作客。

在一个秋日里，陈赓同志来到北川公寓鲁迅的寓所探访。那天，鲁迅先生的兴致很好，特地请夫人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他们畅谈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夜深。鲁迅先生谈不多，多是全神贯注地听着，并不时询问着各种问题。陈赓同志向他介绍了红军反击国民党“围剿”的经过，并谈到了苏区人民的生活、文化建设、卫生条件、军民关系等。所有这一切，都使鲁迅感到新鲜和兴奋。

在这次谈话中，陈赓将军为了帮助鲁迅具体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和斗争形式，随手画了一张革命根据地形势图。送走客人以后，鲁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为了扩大红军的影响，鲁迅准备以陈赓讲述的战斗故事

为素材，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考虑到写作的需要，也为了纪念这次不寻常的会见，他郑重地把这张珍贵的地图夹进一本期刊里。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后来鲁迅没有来得及把这部小说写出来。但是，他与党的感情却越来越深了，他以自己的勤奋工作写下了比小说更为动人的篇章。

红军长征前夕，方志敏同志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作战失利，不幸于1935年1月被俘。在监狱里，方志敏表现了共产党的崇高气节。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利用各种条件，写了许多文稿和密信，这些密信都是用米汤写成的。当时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周围是一片白色恐怖，怎样才能把这些文稿和信件送给党呢？方志敏在苦苦思索中，终于想到了鲁迅。他知道鲁迅和党的关系密切，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找鲁迅要比找地下党的同志容易些，他坚信鲁迅一定会想办法完成共产党人的重托。

信件和文稿辗转送到了鲁迅的手中。一天深夜，鲁迅把送来的文稿放在桌上，用碘酒加水冲洗。上面的字迹很快显现出来。当方志敏同志的署名进入眼帘时，鲁迅的心突然收紧了。这位威镇海内的红军将领，在千里之外，垂危之际，竟想到了自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并把比生命还要贵重的密件相嘱托。这是何等坚定的信任，又是多么珍

贵的情义。

除了写给中央的密信外，还有许多篇文章：《可爱的中国》、《清贫》、《这是一间囚室》……鲁迅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怀着庄严而痛惜的心情，郑重地收藏好这包东西。

在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日子里，鲁迅烧毁了不少信件，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着这些革命文物。事后，鲁迅通过上海中央特科的关系，终于把方志敏同志的遗稿，妥善地转送给党中央。

1935年11月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胜利到达陕北。鲁迅于次年2月得知这一消息，受到极大鼓舞。他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转道巴黎，致电给毛泽东和朱德同志：“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鲁迅充满信心地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促成了全国范围的抗日高潮。

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

题》一文中，明确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目前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是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

十一、民族魂

1933年以后，鲁迅的健康情况逐渐恶化，但他仍然支持着工作，用加紧工作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越到后来，他所写的文章也越多。他常常说：“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在1935年除夕收编成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曾经作过一个统计：“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写到这集子的最末一篇止，共历18年，单是杂感，约有80万字。后9年中所写，比前9年多两倍；而这后9年中，近3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6年。”

1935年底，鲁迅的健康状况愈加恶化，他年轻时曾就患了肺结核，以后又复发过几次，但都抵抗过来了。由于年纪渐大，体质也日见衰弱，长年累月又处在紧张的工作之

中，所以这次发病就显得很沉重。朋友们对此深感忧虑，劝他出国养病。但是，鲁迅仍然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不愿离开正处在生死危急关头的祖国和人民。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鲁迅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一个个追悼会在各大城市召开，无数篇悼文在报刊上发表，雪片似的唁电从全国各地、从世界各国拍来。

中共中央发出了《告全国同胞和世界人士书》，电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光辉的一生，赞扬他“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

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挽词是：“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

10月22日，上海各界群众不顾当局的重重阻挠，由90多个团体，6000余人组成的送殡队伍，为鲁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队伍到达墓地后，先由蔡元培、宋庆龄等作了安葬演说，上海民众代表献上“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盖在棺墓之上。

鲁迅晚年，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声：或者希望他亲自动手写自传，或者表示愿意努力给他作一部传记，但鲁迅总是反对这样做。

早在1936年5月初，鲁迅收到一封北

京来信，又提出了作传的要求，并建议由许广平撰写。鲁迅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明白告诉朋友们，于是5月8日写了一封回信。信不长，但感人至深。他说：“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据当时一般估计，全国人口为四万万），真将塞破图书馆。”他接着写到：“我有许多小小的想法和语言，时而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不过小事情而已。”

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民族魂”，这是中国人民对于他公正而崇高的评价。鲁迅创造的文化思想遗产，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郭沫若同志曾写过：“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这个赞词准确地反应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文化史中的崇高地位和伟大影响。是的，鲁迅不仅属于中国，而且是属于世界人民。鲁迅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根据粗略统计，鲁迅从1907年起到1936年的30年中，创作小说3本、散文1本、散文诗1本，共约35万字；杂文16本，共约650多篇、135万字；辑录、校勘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作，已出版的共约80万字，还有一些尚待整理；翻译介绍俄、法、德、日等古典作家

的作品，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芬兰、荷兰、西班牙等 10 多个国家的现代作家的作品，共计长篇中篇小说和童话 8 本，短篇论文 50 篇，共约 310 万字。

1938 年，《鲁迅全集》20 卷出版，收录了鲁迅的全部作品近 1000 万字。鲁迅的作品被先后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等 50 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都有广大的读者，充实了世界文学宝库。

毛泽东同志对鲁迅一生非凡业绩作出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恩来称颂鲁迅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过渡时代的伟大桥梁”，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鲁迅的一生，跨越两个历史时期，经历了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复杂的局势中，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严于解剖自己，不断探索，不断追求，从一个革命的民

主义者，转变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为“五四”文化革命的先驱，鲁迅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重视改变国民愚弱的精神，改变旧思想和旧习惯，不管它们是多么顽固，多么难以改变。经过一次次血的教训，他逐渐认识到，所谓国民的劣根性，所谓旧思想、旧习惯，都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要彻底改变它们，唯有从根本上变革社会制度。因此，“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鲁迅为了追求救国的真理，付出了自己一生的努力。他经历了千辛万苦，遭遇到种种挫折，积累了血的经验教训。在对各种各样外来思想的比较鉴别中，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鲁迅后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爱国思想是随时发展、有增无减的。在鲁迅的晚年，他把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和谐地统一到了一起。他既是一个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又是一个始终如一的爱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说过：“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

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以自己一生的不懈追求和探索，实现了自己在年轻时立下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报国誓言。鲁迅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华的崛起而不懈奋斗。

